



全球化进程中的 中国道路



雷江梅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全球化进程中的 中国道路



雷江梅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曹 歌

装帧设计：王春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道路 / 雷江梅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01-016785-5

I. ①全… II. ①雷…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
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5515 号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道路

QUANQIUHUA JINCHENG ZHONG DE ZHONGGUO DAOLU

雷江梅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34 千字

ISBN 978-7-01-016785-5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主 编：朱 哲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基础、路径与方式研究
-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道路
- 数字版权文化与法制教育研究

项目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
(项目编号：13YJC710015)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全球化——中国道路开创的历史机遇	20
第一节 全球化形成的条件与动力	20
第二节 全球化的本质与发展趋势	47
第三节 全球化视域下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	63
第二章 中国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探索与开创历程	76
第一节 近代中国卷入全球化的历程及启示	76
第二节 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及原则	89
第三节 邓小平的理论思考与中国道路的理论支撑	94
第四节 对中国道路与全球化认识的不断深化	105
第三章 中国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孕育的丰富内涵	118
第一节 认识中国道路的基本维度	118
第二节 全面把握中国道路的科学内涵	121

第四章 中国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展现的意义	155
第一节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道路.....	155
第二节 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	174
第三节 中国道路与世界的稳定、繁荣.....	185
第五章 全球化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道路认知的新高度	200
第一节 中国道路选择自主性的再强调.....	200
第二节 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属性的再认定.....	209
第三节 中国改革之路新出发.....	215
第四节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再深化.....	219
参考文献	228

导 论

一、研究现状

全球化与中国道路，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从全球化的进程看中国道路，全球化也就成为中国道路开创和拓展的大背景。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很早就已开始，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达到了高潮。在世纪之交，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诸多至今依然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①。这些成果运用不同方法和从不同视角分别对全球化的概念、特征、

① 国外主要成果有：[美]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德] 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法] 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竞、周晓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德] 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以及 [英] 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常志霄等译，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等。国内主要成果有：俞可平：《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俞可平：《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刘康：《全球化/民族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王列、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李惠斌：《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马陵：《疆界的终结：全球化》，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靳辉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韩保江：《全球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蔡拓等：《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庞中英：《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专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著作，诸如刘力：《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崛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年版；刘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长征出版社 2001 年版；李坤望等：《经济全球化：过程、趋势与对策》，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内容、表现和后果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无疑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总是力求如何从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切入研究的具体问题。事实上，对于理论活动来说，“新”不能仅仅从时间上进行界定；恰恰相反，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在“温故”中实现“知新”。近几年国内外有关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大多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将“全球化”与具体研究领域的问题相结合加以研究。诸多学者更多的是将全球化作为研究问题的一个背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分析全球化所带来的效应^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过程中，学术界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党的十七大之后，关于这个问题迅速形成了研究的热潮，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出发，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强调两个30年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等。二是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出发，论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联，如《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等。三是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论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区别，以求划清与它们的界限。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等。四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出发，论述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诸如蔡拓：《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文化全球化——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瑞典]达尤西·杜斯特等：《聚合空间：全球化与文化政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王南湜：《全球化时代生存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博弈》，《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等。对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问题，在21世纪初有关这一问题研究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又有继续深入讨论，比较典型的有汪信砚：《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关于如何走出当代全球化困境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美]史蒂芬·罗奇：《中国的全球挑战》等。

的关系——兼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若干认识问题》等。其中，世界历史及全球化的视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也为一些学者所关注^①。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无法分割的关联，一方面，当代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互重叠、交织，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和推进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全球化进程的成果，也可以看作是全球化发展的指针和方向。因而，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以及中国道路的拓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全球化进程中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的认知水平以及解决全球化时代重大历史课题的能力。

（一）国内外关于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关系的研究

对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学者们一致认为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在当下的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价值追求。从与全球化相契合的角度看，“和谐”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价值是“双和”价值，即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事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对内构

① 关于此问题，近几年主要著作有：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编：《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蔡拓主编：《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张宇燕等：《全球化与中国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李惠斌：《全球化与中国大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发展的外部影响全球化的中国经济与资源环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张宇主编：《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版；迟福林、殷仲义主编：《后危机时代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新兴经济体的新挑战、新角色、新模式》，华文出版社 2010 年版；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美]约翰·奈斯比特等：《中国大趋势》，吉林出版集团、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0 年版；张维为：《中国模式——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等。

建“和谐社会”，还是对外共建“和谐世界”，都不可避免地互相制约和影响。“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反过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和谐的价值追求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种重要认同，将为促进全球和谐打开新的认识视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范式，真正站在全人类根本利益的高度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克服当代社会的弊端，这无疑是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价值追求鼓励更多的主体对全球化的参与，有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建立起更加平等的参与和对话关系，也易为大多数全球化主体所接受，从而推动着全球化向着更加多元、多维的方向发展^①。也有学者从全球化的视角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来的这条道路概括为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既争取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利用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可见这是一条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的阳关大道^②。还有学者这样谈道，如果把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比作一辆汽车的话，时代特征与发展阶段就是它的定位系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它的控制系统和动力系统，“四位一体”格局及其外延部分就是它的底盘和框架，党的领导就是它的操作系统^③。而这个时代特征解答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邓小平反复指出，并经几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向国际世界开放并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过程。同时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也形成了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④。

对于全球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机遇与挑战，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之所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与成绩，与全球化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难得机遇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学者们普遍认同在机遇面前，艰难的挑战也无时无刻不存在。国外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分析道，“全球化赐予一些东西，同样也会拿走一些东西”。无论是从全

① 徐艳玲：《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论坛》2011年第6期。

② 赵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12期。

③ 李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④ 徐艳玲：《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论坛》2011年第6期。

球商业周期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全世界集体致力于全球化建设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他认为在日趋不受约束的跨国贸易、资本、信息和劳动力流动中，中国所获得的利益比其他国家都要多。但是顺风不会一直持续，也会有逆风。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既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中国要抓住这次机会，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改革上，特别是那些能为需求已久的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提供支持的改革。中国将面对严峻的全球挑战形势，从而支撑世界商业周期中的下行阶段。外向型的中国经济现在又一次到了审时度势的紧要关头^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中国经济取得成功之后，我们还看到一些新的挑战。首先面临的是中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其次是全球经济放缓的形势之下，不断增长的全球保护主义；第三个主要挑战，就是环境方面的压力^②。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是公认的。然而，在取得的成就同时还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在解决刻不容缓的经济发展问题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矛盾、挑战和困难。首要的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矛盾。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社会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出现了诸如失业现象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协调、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教育系统不够健全等几大领域的问题。此外，具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体现得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主要依赖于大量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从而实现了出口增长，以及千方百计地吸引外国资本并获得先进的现代化生产技术从而积累财富资本。然而，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富有竞争力的国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需要的是技术熟练的、掌握先进技术的而非廉价的劳动力^③。总之，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划时代的、杰出的，但是也不能忽视未来可能遇到的重大挑战。

国外学者站在不同角度的分析无疑对我们能正确看待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打开了视野。国内学者进而指出，“9·11”事件给21世

① [美] 史蒂芬·罗奇：《中国的全球挑战》，《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第4期。

②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需要新的改革》，《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第4期。

③ [俄罗斯] M.П. 季塔连科、李瑞琴：《前进中的中国——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及展望21世纪中国发展前景》，《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纪初的国际形势、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也为我国抓住有利时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机遇。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我国如能像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瑞士一样，相对处于中立国的立场，成为烽烟四起中的“世外桃源”，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会有一个从未有过的极其良好的外部环境。^①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将当今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国际机遇概括为八个方面：第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第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第三，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第四，美国称霸全球的“雄心”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五，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第六，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已开始有所复兴；第七，世界上的矛盾很多，可利用的矛盾也很多。第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求于我国的方面也不少。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挑战表现为：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企图绝不会改变；第二，加入WTO后对我国的挑战；第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第四，近年来我国面临着输入型恐怖势力的威胁^②。

国内学者试图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寻求应对经济全球化对策的思想资源。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其晚年提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推断东方社会可以试图通过非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对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制度早已建立，并已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因而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必须有开放的环境，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为后发国家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前中国要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主要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这一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必须注意转型过程的双重性、过渡性、开放性等特点。后发国家想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抓住全球化所提供的技术、发明广泛传播的历史机遇，因而唯有加强对外交往，积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我们在实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跨越发展战略时，必须把对外开放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我国历史上的“盛唐气象”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只有海纳百川地虚心学习别人

① 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0页。

② 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02—108页。

的长处，才能创造辉煌^①。对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政治方面的挑战，有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各种新的权力结构与过程，国家权力的行使空间及范围受到了明显限制，此外还出现了“民主赤字”及政治权力自上而下、自上而下转移等现象。然而，由于国家是现代社会唯一能够对其成员拥有合法强制力的政治组织，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因此，国家不能单纯地强化或者削弱其权力，而必须根据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对自身的权力结构与过程进行灵活的调整，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②。对于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与应对，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当今全球问题日益凸显，旧的国际规则和国际体系已经难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求，迫切需要我们原来的规则和体系进行改造从而适应新的形势。在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需要我们抓住机遇，充分发挥本土文化对全球文化的补益、建构作用，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理念能为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所认同，为治理全球化提供有益的指导作用。^③

（二）国内外关于全球化与“中国模式”的研究

学术界对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研究在不断推进，实际上，“模式”、“道路”、“经验”虽提法不同，但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与“中国道路”密切相连，也是“中国道路”研究的内容。很多时候“模式”也是“道路”进程的一种静态的反映，但学术界普遍主张提“道路”为宜，不必急于定性中国模式。

对于中国模式意义的讨论，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 21 世纪国际发展的一件大事；中国模式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改革开放实际上包含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层面，探讨中国模式应当把改革开放置于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这两个层面中去探讨其价值及其意义。中国模

① 王培暄：《全球化视野中的东方社会理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

② 唐士其：《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 年第 2 期。

③ 蔡拓：《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文化全球化——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6 期。

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①。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崛起在西方总是很有争议，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自信地对中国做了许多悲观的预测。但事实证明，中国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崩溃了，而“中国崩溃论”却崩溃了。有学者提出用“中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的显而易见的总体成功，并将中国模式概括为八个方面的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以及八大理念（即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②）。如果说中国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提供的更多是发展经验，那么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来说则表现出的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让美国人忐忑不安了，如果再将中国的崛起上升为一种理论则更让美国人忧心忡忡。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此外，跟随各种威胁论之后的是应对中国的各种策论，诸如“遏制”、“抗衡”、“围堵”等，不胜枚举。当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抛出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③。可见，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中国崩溃论”，无论是善意的欣赏赞扬还是恶意的讽刺贬低，所依据的都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理念。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称道的西方人也开始渐渐关注中国模式。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仍旧是起源于西方^④。“北京共识”提出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

① 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② 参见张维为：《一个奇迹的剖析：中国模式及其意义》，《前进论坛》2011年第5期。

③ 对“中国威胁论”的种种讨论，见 Zheng Yongnian,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预测中国解体的讨论，可以参见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④ 最早讨论“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可以参见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作者认为“北京共识”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之后，这一提法在中国引起广泛讨论，例如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它与中国发展模式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无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的动机与意义如何，都为国内外深入研究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个契机。

基于全球化的视角，讨论“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同雷默所说“北京共识”不能等同。雷默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解和阐释，虽然具有若干合乎逻辑之处，特别是由此掀起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热潮，进而引发了世界各大主流媒体对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但是，他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这显然是与中国模式的本意和宗旨背道而驰的。中国模式旨在总结自身的经验，讲清楚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成功的，并没有把自己的发展看成是与其他国家一道“的共识”，把自己看作是像“华盛顿共识”那样要往外推销的东西，只是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供他国借鉴和参考而已^①。国外学者提出，对于“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这两个概念，必须严格区分。首先，两者都意在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一旦将其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中，两者的意义就迥然不同。“中国模式”着重于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旨在阐明中国是如何进行改革开放并取得初步成功的。“北京共识”则不同，它虽也是总结中国经验，但是带有明显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意味。总结中国本身发展的经验很重要也很必要，但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共识”，甚至认为会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是歪曲。事实上，中国发展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不会接受任何所谓“共识”，更不会根据所谓的“共识”来指导自身的改革实践。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理念强调的是“和而不同”，强调并尊重各国发展经验的多元性。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急于将现有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而是如何完善所谓的“中国模式”，从而使这个模式能够可持续、更加科学^②。国内学者针对这一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种对于推广“北京共识”可能产生霸权的担忧可以理解，但它是建立在假定“中国模式”的绝对特殊化基础之上的，意味着在中国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只属于中国。然而，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假定的合理性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全球化，已经使每一个国家

① 徐崇温：《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② 《中国须慎言“北京共识”》，《参考消息》2008年2月22日。

所发生的事情必然影响到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只是影响的程度大小不同而已。正如人们普遍认识到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必然会影响世界^①。雷默在他的《北京共识》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的概念，核心观点是：中国竭力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在全球化世界的未来”^②。他注意到，20世纪末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进程普遍感到担忧。与此同时，本土化也在加强。全球化和本土化表达了世界和中国复杂的当代关系，“北京共识”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诞生的。有学者试图从根本上给“中国模式”一个科学的定义，以此来纠正国外对于“中国模式”的不成熟的看法，同时划清“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的界限。这种认识持有的观点是，“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同时也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方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质就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③。一个国家只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中国没有照搬别国的路，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道路。

对于全球化与中国模式的关联，有学者认为，站在全球视野考察中国模式，要反对两种对立立场：一是抽象的普遍主义立场，二是抽象的特殊主义立场。在此基础上坚持具体普遍论，坚持普遍与特殊具体的历史的统一^④。有学者指出，任何一种充满活力、具有顽强生命力、具备充足生长空间的发展模式，既包含着在特定地域、特定国度所产生的特有的文化、传统、环境、资源、人口等国情条件方面的特质，同时也包含着在应对人类发展难题、解决生存和社会进步、社会组织和制度等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

① 杨学功：《全球化与“中国模式”——兼谈雷默的“北京共识”》，《学术界》2010年第1期。

② [美]雷默：《北京共识》，转引自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③ 杨学功：《全球化与“中国模式”——兼谈雷默的“北京共识”》，《学术界》2010年第1期。

④ 《中国特色研究范式：内涵、特征与实质——李景源访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5月8日。